

618

~~0212.4-43~~
237

上海商业史

F-729-5
Z81

主 编 朱国栋 王国章
副主编 单 宝 周安珍 陈春舫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商业史/朱国栋,王国章主编. -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7

ISBN 7-81049-295-0/F·243

I. 上… II. ①朱… ②王… III. 商业史-上海 IV. 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383 号

SHANGHAI SHANGYESHI

上海商业史

朱国栋 王国章 主编

责任编辑 王芳 封面设计 未名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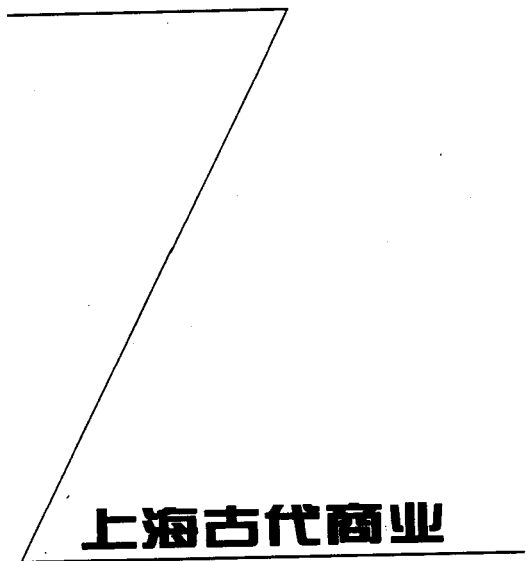
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6.5 印张 428 千字

印数 0 001-2 500 定价:32.00 元

第一编



上海古代商业

1907

第一章 上海古代商业探源

一、上海地区的成陆

上海地区指现在上海市区域,包括市区和郊县。上海在古代曾经是一片海洋。在嘉定区的方泰、宝山区的北宗、闵行区的七宝和闵行及闸北区的彭浦、徐汇区的龙华等地下深约4~5米处都曾发现鲸骨。上海地区的陆地形成时间,自西向东主要可以分为三条线:

其一是位于上海地区中部的冈身。冈身是由海浪、江流带来的泥沙和贝壳砂形成的古滨海砂堤。今因其地势高亢,故称其为“冈身”。冈身西界一线,自江苏太仓,经外冈、马桥、胡桥至王盘山。据解放后出土文物和史地学家考证,这条天然海堤形成于六千五百年前。这条砂堤形成以后,在其东侧又先后形成2~3条同样性质的平行砂堤。海岸线逐渐东移。最东一条,即冈身东界——娄塘、嘉定、南翔、柘林一线,形成于四千年前。冈身是由先后几条平行的滨海砂堤形成的。冈身的宽度在西北部为8公里左右,在东南部为1.5~2公里(见图1-1)。冈身是上海地区至今发现的最完整的天然古海岸线。冈身以东则多以古海塘的形式表示海岸线的位置,而海塘主要由人工填土修筑而成。

其二是位于盛桥、月浦、江湾、北蔡、下沙,直至南汇县航头一线。《新唐书·地理志》和南宋初年的《云间志》均有关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在此线上修筑捍海塘的记载。解放后野外地质调查发现月浦至下沙一线,有断续的地下沙带。由此推断,这一带以西地区在唐代中期已经成陆,不迟于公元8世纪初,距今一千二百年。

其三是近海的,从川沙经南汇到奉城、柘林一线。南宋乾道八

年(1172年),沿该线修筑了里护塘(又称老护塘)。文物考古资料证实,高桥、惠南镇等地均有出土南宋墓。因此这一线的成陆不迟于宋代中期,距今八百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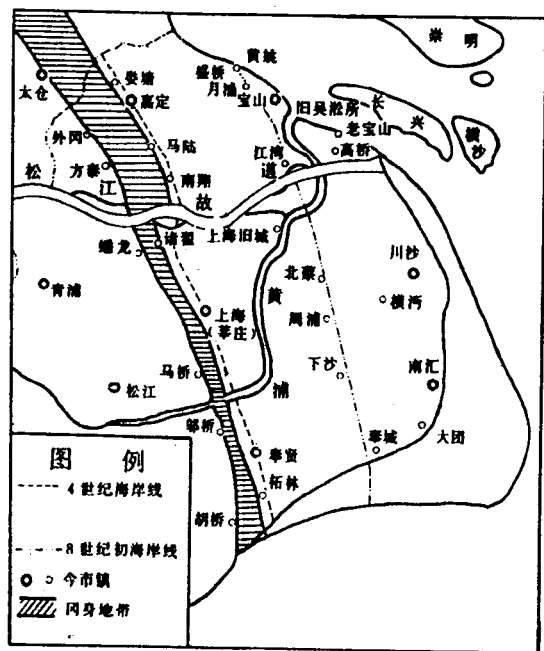


图 1-1 上海地区成陆示意图

基,但至今仍可清晰地辨认出昔日海塘的原形。钦公塘修建以后,在成陆过程中,逐渐形成向海突出的南汇嘴。在海滨新成陆的土地上先后又修建了内小圩塘和外小圩塘,外小圩塘又称彭公塘。现在的海塘——人民塘始建于1906年,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海岸线。

在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中,海岸线不仅不断向海推进,同时还在向后退缩。从冈身形成到捍海塘修建的几千年间,杭州湾北部的大、小金山与大陆相连。自公元8世纪以后,杭州湾北岸由于受强

以上是随上海地区成陆的先后形成的三条海岸线——冈身、唐代海岸线、宋代海岸线。宋代以后,海岸线继续向东推移。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始筑外捍海塘。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南汇知县主持加固重修,遂改称钦公塘。钦公塘是距今四百年前的海岸线。钦公塘土堤现已大部分作为公路路基,

潮波冲击,陆地大片坍塌,大、小金山等遂与陆地分离,成为海中孤岛。长江南岸也有类似情况,在月浦、宝山、高桥附近,因明末清初崇明岛扩大,长江主航道南移,受江流冲刷,河岸坍江现象严重,位于高桥外侧的宝山老县城也已坍入长江。

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除三角洲主体部分随海岸线向海推进而日益扩大外,河口沙洲的形成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崇明岛的形成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长兴岛露出水面的时间只有两百年左右。据地质学家研究,崇明岛将逐步并靠江北,成为大陆的一部分;而长兴、横沙两岛则有合并扩大而取代崇明岛地位的趋势。

二、上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

上海地区的成陆由西向东推进,上海地区的经济(包括商业)

亦是由西向东发展。上海地区商业探源须着眼于冈身以西地区。

解放后上海冈身西部地区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的古文化遗址 25 处。其中对青浦城东 5 公里崧泽村假山墩的考古发掘,发现下层古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古人的居住遗址。经碳 14 测定,距今六千年前。在金山区的查山、青浦县的福泉山,也发现马家浜文化的居住遗址。假山墩中层被命名为崧泽文化。经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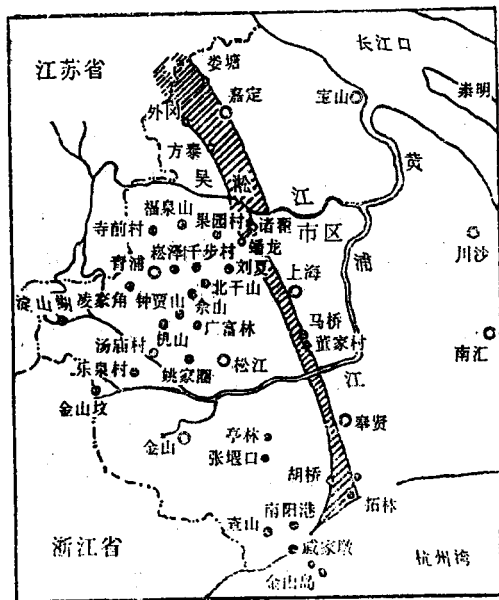


图 1-2 上海地区古文化遗址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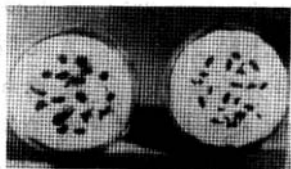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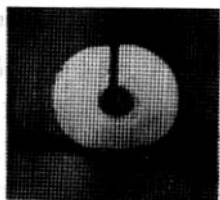
发现马家浜文化的居住遗址。假山墩中层被命名为崧泽文化。经碳

14 测定,距今五千多年前。属崧泽文化类型的遗址,除崧泽中层古文化外,还有青浦县的福泉山、寺前村和金山坟,松江区的汤庙村、平原村和姚家圈等处。假山墩上层则属于良渚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这一类遗址和遗迹,尚有闵行区的马桥,奉贤县的柘林,金山区的亭林与张堰口,松江区的广富林和汤庙村,青浦县的福泉山、金山坟、果园村和寺前村等十余处。到了夏商时期(约距今三千年前),在上海地区居住生活的是被称为马桥文化的古人。马桥文化是以闵行区马桥遗址第四层作为典型命名的。这类遗址还有闵行区的董家村,奉贤县的柘林,金山区的亭林、张堰口和查山,松江区的平原村、姚家圈和汤庙村,青浦的刘夏、福泉山、金山坟、千步村、寺前村和淀山湖(塌陷入湖底的遗址)等。

三、上海地区商品交换的出现

崧泽村假山墩的下层以及金山区的查山、青浦县的福泉山遗址,说明早在六千年前,古人已在上海西部劳动生息。这三处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是以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命名的,是我国太湖地区的早期古文化,它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青莲岗期,以及长江上游的大溪文化大致同一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上海,在松江的佘山、凤凰山和天马山等山地上,有茂密的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的混交林,平地上多湖泊沼泽,气候温暖湿润,与浙江的中南部相近,生存的动物群有梅花鹿、麋鹿、水獭、牛、狗、猪、龟、鲤、蛤、蚌等,其中狗与猪已成家畜。古人在高地上搭建干栏式建筑居住,在地下挖地窖储藏食物,在崧泽一个废弃的地窖中,发现了许多炭化的谷粒,有籼米和粳米,是人工种植的稻谷。在崧泽还发现了水井,这是我国最早的水井。使用的生产工具,都用石、骨材料制作。石器的制造在打击成形后,还经通体磨光和钻孔。石器的种类有砍伐用的长方形单孔石斧和斫木用的扁平单面石锛。骨器有骨箭头和骨锥等。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尚处于用泥条盘叠的手制阶段,而且入窑在氧化炉中烧成,因此,陶器大部分呈红褐色。陶器

的种类有搁置在土灶上炊煮的带宽沿的釜,灶中使用的炉算,盛物用的浅盘高把形豆和敞口的盆,盛贮用的带牛鼻形器耳的罐,盛水用的有鸡冠形器耳的壶,以及捻线用的纺轮等。身上佩戴的饰件,有玉玦和骨管。玦是马家浜文化古人特有的耳环,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工艺史上最早的玉器之一。人们死后埋葬于氏族的公共墓地。发现的墓葬,一般都是单身葬。有两人合葬的都是两个女性或两个男性的同性葬。显示在母系氏族公社,实行男子出嫁的族外婚姻状况,夫妻分别属于不同氏族,死后不能埋在一起,只有母子、兄弟、姊妹属于同一氏族,死后可以同葬。墓内的陪葬器物极少,甚至无随葬品。



六千年前马家浜文化的稻谷、陶釜、玉器

形式的产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工,即不同的生产者分别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二是生产资料、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占有。这两个条件在六千年前的上海母系氏族社会已具备。首先,氏族内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工:渔猎和种植水稻、饲养家畜,磨

前述一切告诉我们:六千年前的上海母系氏族社会,人们获得的生活资料不多,但较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生产工具有改进,生产技术有提高,从地窖贮藏食物、有随葬等可以证明,已有剩余产品。可以断定,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形式——个别的、偶然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已经产生。这种交换

制石器,制作陶器、玉器等。第二,氏族内部出现了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家庭私有,这从陪葬器物的有无、多少可以证明,在氏族内部可能已出现以妇女为主的对偶家庭。由于氏族内部的暂时分工和生活资料、生产工具的家庭私有,使得氏族内部各个家庭之间偶尔也需要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即在部落内部各个家庭之间出现了个别的、偶然的商品交换。但是这种商品交换还没有成为社会所必需。

四、上海地区商品交换的扩大

历史发展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继承马家浜文化的是以青浦崧泽村假山墩中层为代表的崧泽文化。如前文所述这类遗址在上海除崧泽外,尚有多处。遗址的增多反映人口有所发展。在崧泽文化时期,上海地区的古人处于从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阶段。生产工具出现三角形单孔的石犁,农业从耜耕进入犁耕阶段。人们食后丢弃的动物碎骨出土数量比马家浜文化时期大为减少,而墓葬中 useful 猪鬃骨陪葬的现象,说明渔猎活动减少,而对猪进一步重视饲养。陶器在手制的基础上,使用旋转的陶轮修整,器形比较规整,形制精巧多变,种类增多,有淘米用的沉滤器,以及杯、觚、瓶、勺、匜等饮器和盛水器。这些器皿往往在器表装饰刻划藤竹编织形图案,或描绘带形和弧线组成的红、黄色彩绘。已有能力制作多种玉器,有玉璜、玉镯、玉坠、玉珩等。人死后仍葬于公共墓地,随葬品逐渐增多,死者身旁普遍有石斧、石镞和陶鼎、陶豆、陶罐、陶壶等器物。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已经出现,在陶器上刻划有“M”、“卍”和“卐”等多种符号标志,也是私有制观念的一种反映。在青浦县福泉山的第三层崧泽文化晚期墓地,发现一座男女合葬墓和一个成年男子在中间、左右各依附一个儿童的三人合葬墓,说明已经逐步出现父系家庭。上述现象告诉我们:五千年前上海母系氏族社会已是繁荣阶段,氏族内部分工已明显发展,家庭私有制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换逐步成为社会所必需。

五、上海地区商品生产的开始

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崧泽文化逐渐演变为良渚文化。此时上海地区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代替，逐渐向产生阶级、建立国家的方向演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和家畜饲养不仅能提供较多的生活资料，也能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从出土遗物来看，此时掌握了比较进步的水稻种植技术，如使用石斧和三角形带柄大石刀砍树、锄杂草；耕田使用三孔石犁；有了石耘田器，已知道进行中耕除草；出现了一种捻河泥的工具——千筴，可能掌握了施肥技术。产量有很大提高，所以普遍使用收割工具石镰。粮食有了较多剩余，可以酿酒，在陶器中壶、杯、盃等饮器占了很大比例。除水稻外，其他作物的培植也发展起来，在有些遗址中发现蚕豆、芝麻、花生和甜瓜等。掘井技术更加进步，在青



新石器时期马桥人头骨复原像

浦县朱家角西漾淀养殖场发现的良渚文化水井，已经以去皮的大树对剖挖空而成的弧形大木做水井圈。随着生产的发展，有的手工业已与农业分离，如制造陶器，使用快速旋转的陶轮制成器形，而且还可以密封，用还原焰烧成灰色陶器，有的还进行渗炭处理，使陶器的表面有一层铅黑色陶衣，这些难度很高的技术是专业陶工才能掌握的手艺。陶器的器形各地出土的都相似，像是同一地点的产品。玉器的制造数量多而且造型、花纹优美，表面光可鉴人，其技术也非

一般家庭手工业所能胜任。在亭林等地还发现竹篾编织的篓、谷箩、篮、箬、簸箕、千筴及席子等，这些编织物的花纹，有的作人字形、方格形，有的呈梅花眼、菱形花格，从技术难度看也是一种专业竹工的产品。在有的遗址发现了残麻布、绢片和丝带等。麻

布的质地为苧麻,织物密度达到每寸40~60根。绢片是用家蚕丝织成,密度每寸120根,显示出相当高的纺织技术和养蚕缂丝经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必然出现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①由于手工业同农业分离,手工业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逐步变成个人财产,氏族公社共同耕种的土地也逐渐变成了私有财产,原始氏族公社逐渐解体,代之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从人们死后的埋葬情况可以从侧面反映私有制的发展程度。此时的墓地有平民墓地与显贵墓地的区别。在闵行区马桥遗址发现十座平民墓葬(其中一个成年女性的头骨,经复原,面相与现代上海市郊的女性相似),每座墓的陪葬极其贫乏,有三座空无一物。平民墓地靠近村落,位于西方与北方,墓位分散,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纽带已经比较松散。首领和显贵都埋于高土墩上,这些土墩是在平地上用大量人工取土堆筑而成。如青浦县福泉山的墓地,高7.5米、东西长74米、南北宽84米,有数万立方米堆土。他们在土墩上面挖掘长方形土坑作墓穴,埋葬时有棺有槨,棺用一棵大树对剖后,中间挖空而成。墓内有许多精美的玉、石、陶器和象牙器陪葬,甚至使用奴隶殉葬。例如福泉山第9号墓,墓主身下垫玉璧,手上戴玉镯,胸前有玉珠、管、坠串成的项饰,身旁有玉石精制的钺、琮、璧、锥形器等一百余件,以及一件罕见的象牙雕刻。再如福泉山145号墓,在墓主土坑的北侧,另有一小坑,埋葬两个奴隶,屈肢侧身,双臂朝后弯曲,头骨面部朝上,有一种反缚挣扎的状态。年龄一为30岁左右,一为17岁以下。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使商品交换随之发展,粮食、家畜、陶器、玉器、竹器、麻布、丝织品都被投到交换中去。交换不仅在部落内部进行,也在部落边界间进行,而且可能已达更远的地方。《管子·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度》篇说：尧舜的时候，“北用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说明黄河流域的部落和西北、长江流域之间已有交换。从福泉山9号墓出土的象牙雕刻可能是从南方通过交换得来的。

六、上海地区商业的产生

到了夏商时期，在上海地区居住生活的是被称为马桥文化的古人，距今约3700~3200年。地域分布与前一时期的良渚文化相同，大致东到海滨，北到长江南岸，西与镇江、南京地区的湖熟文化相邻，南与浙南的印纹陶文化接界。考古学家认为，马桥文化可能起源于良渚文化而接受了南方印纹陶和中原地区文化影响的文化遗存。生活用具中炊具多为鼎，其质地和制法（多用轮制）与良渚文化基本相同；生产工具，如石镞、三角形石犁、石耘田器等也都与良渚文化基本相同。而几何形纹陶在制法、造型或纹饰等方面同良渚文化却有显著不同，可能是受浙南、闽北印纹陶影响。石器中大量扁平三角形石犁及陶器中觚、觶、尊、盃、豆等形制与相距千里之外的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极为相似。马桥文化遗址还发现刀、凿、镞等小型青铜器，但未发现铸铜工具。众所周知商代的青铜器已很发达，上海地区的青铜器可能是通过交换而得来的。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它的建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我国历史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夏王朝的建立是从禹开始的。禹原是黄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一部落的首领，由于治水有功，博得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取得了最高统治地位，确立了王权。禹死之后，他的儿子启破坏了民主选举的禅让制，自己继承父亲的位置，开始了王位世袭制。考古学家从马桥文化遗存判断，受夏商文化影响，马桥文化古人已经同中原夏商文化有一定接触。从《禹贡篇》等古籍中，也可发现当时的上海地区与夏王朝的关系。

禹时洪水泛滥。考古学家认为上海地区当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曾致使沿海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海浸。上海地区的先民也曾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禹治水十三年，其足迹到过江南，禹死后葬在会稽（今浙江绍兴）。

据《禹贡篇》记载，禹接位之后，重新划定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冀州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约为现在山西、河北及河南黄河以北，辽宁西端，渤海北岸一带。上海地区归扬州，扬州地域约为现在安徽、江苏南境，浙江、江西北境。《禹贡篇》还记载了各州向夏王朝进贡的贡品，其中扬州的贡品是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美石如玉）、箬筩（竹）、齿（象牙）、革、羽（鸟羽）、毛（兽毛）、木（硬木、豫、樟之类）。由《禹贡篇》记载可知，上海地区已是夏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上海地区也会有一些产品参与朝贡。

禹十分重视商品交换的作用。据《尚书·皋陶谟》记载，禹在治理洪水时曾说：“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义。”意思是：治水以后，又要和稷一起教民播种百谷，给人民提供粮食和肉食；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禹接位之后，即以发展贸易为要务之一。治水以后，各州的人贡的道路已经畅通。如扬州，沿江海可达淮河、泗水。每州均有船舶可利用。当时各州人贡之贡品，也是各州的土产。治水以后，生产发展，贸易也日益繁荣，人贡的道路是商品交换的通道，人贡的商品是互通有无的商品。上海地区马桥文化古人的商品交换的空间，比以前更广阔。

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进入交换过程的产品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物物交换的形式逐渐成了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便产生了货币。货币的产生，使原来的物物交换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商品——货币——商品（W——G——W）。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做商品流通，但还是一种简单的商品流通，即商品生产者出卖商品，换回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简单商品流通使商业的产生具备了可能性和必然性。简单商品流通把物物交换中的买卖行为分解为买和卖的两个独立过程。这样使商人有可能插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专门从事商品的买卖活动。在市场扩大之后，商品生产者集中精

力和时间发展商品生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由专人去做。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①就出现了。

在物物交换转变为商品货币相交换的过程中,牲畜最先被用来充当货币。夏王朝以黑色贝壳当货币,还以帛为货币(《文献通考》载:夏人谓钱币为布)。史学界认为我国“商人”始于历史上商地方(今河南漳河地区)的商族人。上海地区六千年前出现商品交换,五千年前商品交换扩大,四千年前产生商品生产,因而,夏商时期先出现简单商品流通,而后产生商业,这是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第二章 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海商业

(公元前 11 世纪中期~公元 589 年)

一、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 11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 771 年是我国历史上继夏、商以后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史称西周。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元年)周迁都洛邑到公元前 221 年,史称东周。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476 年,叫春秋时期;公元前 475 年到公元前 221 年为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开始兴起;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基本确立。

(一)吴国的建立和吴、越的政治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商末周初,周人来到江南,建立了吴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文王姬昌的伯父太伯、仲雍为避王位之争来到当时被中原人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四传至周章,周武王克殷之后,成为周王朝的封国。

西周与春秋时期,上海地区(冈身以东尚未成陆)属吴国;入战国越灭吴,属越国;至楚威王时伐越,尽取吴故地,上海又入楚。越国,据《史记·夏本纪·越世家》说禹死后葬在会稽,禹的第五代孙帝少康,封庶子号于越,掌禹的祭祀。商周时期,越国的活动,古籍缺载。春秋时,吴越之间基本上以浙江为界。楚国原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大的部落联盟,西周初年其首领被封子爵,后立国为楚。春秋时期楚国强大,到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从吴、越、楚的一些历史记载中,可大体反映当时上海地区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

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两件重大政治事件推动了上海地区经济及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一是西周时期,上海地区成为周王朝封国——吴国的组成部分,扩大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带来了

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促进了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重法爱民”的政治改革,使上海地区封建经济逐渐兴起。

春秋时期,由于铁犁等铁器的使用和推广,促进了奴隶制的逐渐解体,促使各国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改革。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的政治改革是最著名的,被称为“五伯改政”(政治改革)^①。他们这种改政的实质,是要改变西周家长奴隶制王权统治,实现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封建霸权统治,史称他们“重法爱民而霸”^②。所谓“重法爱民”,就是修法制,爱庶民。庶民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奴隶。越国大夫文种解释“爱民”的内容是:“利之(民)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并说:“无夺民之所好,则利也;民不失其时(农时),则成之(成其农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③这种对庶民实行利、成、生、与的爱民政策,就是废除家长奴隶主对庶民具有生杀予夺权的法律规定,改变庶民的奴隶地位,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

西周吴国的建立,尤其是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改政以后,江南包括上海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楚破越以后继续发展。

第一,江南及上海地区农业的发展。

周王朝重视农业,周太王古公亶父就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奠定日后周朝王业的。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来到江南之初便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数年之间,民人殷富”^④。自春秋晚期起,由于吴、越国的庶民已从奴隶转变为个体农民,表现出较高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由于青铜农具增多,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开始,有利于农田的大规模开发和生产的发展。所以当时吴、越农民积极开辟农田,种植谷物。在吴国,“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⑤,

① 《战国策》卷29,《燕一》。
② 《荀子》卷11,《强国篇》。
③ 《吴越春秋》卷8,《勾践归国外传》。
④ 《吴越春秋》卷1,《吴太伯传》。
⑤ 《国语》卷19,《吴语》。